

从本质上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

李洪峰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对强国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贯通把握其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思想内涵,从本质上理解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思想自觉,并将其更好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行动自觉。

深刻把握深厚理论渊源。读懂理论源头,才能更好把握思想演进的逻辑。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形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等内容,确立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逻辑起点,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在百

余年管党治党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深厚历史积淀、浸润了鲜明文化底色。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坚守“魂脉”和“根脉”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上的强烈使命担当。

深刻把握坚实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系统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恢宏探索的理论结晶,是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形成的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鲜明主题,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突出强调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既有现实观照、又有未来指向,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的有机统一。

深刻把握丰富思想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以“十四个坚持”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进行了集中概括。“十四个坚持”展现出三方面特点:一是贯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复兴,深刻揭示强党是强国的前提和保证、强国是强党的目标和支撑,将党的建设置于强国复兴全局中谋划和推进。二是贯通守正与创新,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内容,又科学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鲜明标识性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概念和命题。三是贯通认识论与方法论,既部署全面从严治党“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如何管党治党“桥或船”的方法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之中,总有贯穿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焕发蓬勃生机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理论渊源上明其由来、从实践基础上悟其生成、从思想内涵上察其要义,才能真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学透,让这一重要思想入脑入心、落到实处。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以更加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原载《人民日报》2026年9月23日第09版)

活化岭南文化 深耕“大思政课”实践路径

陈锐钊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弘扬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落地落实的重要实践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思政育人,不能仅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还需依托实践载体搭建可落地的实施机制。校社协同正是打通文化传承与基层思政育人的有效路径之一,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广州市燕塘社区为此搭建“粤韵诗心,立德树入”共建项目,立足地域文化特色,以粤语为传播载体活化传统诗词文化记忆,秉持科学价值导向对古典诗词蕴含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进行时代化价值转译。项目构建“载体活化—价值转译—主体建构”三层递进式实践路径,有效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层传播、活化与育人落地的闭环,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城市基层社区的创新性活化、常态化利用与思政育人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与范式参考。

大思政课视域下岭南文化活化利用融入社区实践的价值意蕴

“大思政课”依托宏大历史视域、大视野、大课堂三维架构重塑育人体系,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思政教育存在的某些困境。以宏大历史视域为引领,将思政教育置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与百年党史的宏大脉络中审视,为文化传承赋予深厚历史纵深;立足大视野,紧扣国家战略阐释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推动社区文化实践同国家发展同向同行;依托社会大课堂打破校园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推动

思政教育由课堂延伸至日常生活场景。“大思政课”为岭南文化的活化利用提供了空间载体与育人机制,岭南文化为“大思政课”注入了文化根基与价值内核,二者相辅相成,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验证的现实实践,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文化育人重在日常浸润与情感共鸣。作为社会大课堂的基础单元,社区是文化浸润与价值培育的前沿阵地。社区依托高频人际互动与浓厚情感联结,可实现价值观从外在灌输到内在认同的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活态传承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从千年商都的“敢为人先”到特区精神的“闯出新路”,从三元里的炮火到中共三大的明灯,岭南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讲述一部“活的历史”,是大思政课最生动的课堂。醒狮、粤剧、龙舟、英歌舞等岭南非遗承载敢为人先、同心团结的岭南精神,更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共同体建设的天然思政资源。社区、中小学校、高校通过携手联动,打造思政教育社会大课堂,把岭南文化转化为青少年思政教育素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社区的活化落地。粤语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由粤语产生的语言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联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共同体、实现高质量思政育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岭南文化活化利用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联手广州

燕塘社区构建校地共建机制,开展“粤韵诗心,立德树入”主题微课堂,覆盖社区青少年及家长累计300余人次,形成“载体活化—价值转译—主体建构”三层递进的文化传承实践路径,通过粤语诗词朗诵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以科学的价值立场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对岭南文化的创新传承。

(一)载体活化:以粤语诵读激活文化记忆

粤语作为广府人的母语,不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情感记忆的容器与文化身份的象征,深度唤起广府居民的乡愁与集体记忆。以粤语为载体开展文化传承,能够提升价值传播的亲力和。粤语九声六调的语音特点能够精准还原古典诗词的古音韵,粤语诗词诵读能够营造出沉浸式仪式感,以乡音承载中华文脉,使居民在熟悉的语言韵律中自然建立起与文化的深层联结。项目围绕微课堂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的培养到个人品格与理想信念的培育,形成了“家国—社会—个人”的育人逻辑。

(二)价值转译:以科学的价值立场完成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价值转译以科学的价值立场对古典诗词进行创造性转化,将一首首写在典籍里的唐诗宋词与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建立起真实的关联,使古典文本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如将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羁旅意境,通过价值转译,形成引导青少年在数字时

代锚定人生目标、沉淀自我内核的教学素材。

(三)主体建构:推动学习者从文化体验者向价值践行者转变

衡量实践育人成效的核心标尺,在于育人对象的主体性蜕变。本项目开展效能取决于能否推动青少年从被动的文化体验者转变为主动的价值践行者。项目建立《美德成长手册》,依托微课堂学习积累成长积分,通过积分兑换社区公益服务,以公益实践助推价值内化,构建“知—情—意—行—知”闭环式价值生成体系,推动社区青少年完成从文化消费者向社区贡献者的身份跃迁。通过项目培训,推动青少年成为新的岭南文化传播者与社区文化治理者。当社区青少年自觉将传承粤语文化、参与社区治理视为己任时,文化传承就实现了从“外部要求”到“内在需要”的转变。

“粤韵诗心,立德树入”共建项目通过深度校地共建,搭建“载体活化—价值转译—主体建构”三层递进模型,构建“方言+传统文化+社区治理”的多维育人框架,有效解决了社区思政教育悬浮化、融合浅层化及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社区活化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作者简介】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2026年度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第二个结合’融入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创新研究——基于校地共建‘社会大课堂’的探索”(2026—JG—27)研究成果】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皇家力量、地域环境与多元文化交流共同作用的产物。其造像营建历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演变特征,整体格局由大型皇家洞窟逐步转向中小型民间造像,造型语言也由雄健厚重向清秀轻盈变化。本文从开凿背景、武州山选址、造像与空间艺术以及文化价值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云冈石窟并非单纯移植外来样式,而是北魏时期对印度、中亚等艺术元素吸纳融合、重构再造的成果,最终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石窟艺术体系。

开凿背景

石窟寺建筑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专供僧侣开展寺院宗教活动,其建筑空间、内部结构、主题设计以及造像布局,都与洞窟的使用功能相互关联。石窟寺是开凿在山崖河畔的寺庙建筑,因洞窟的使用功能不同,其建筑形制也有所差异,有大像窟、塔庙窟、佛殿窟、佛坛窟、禅窟、僧房窟、瘞窟等,石窟群就是由多种不同功能的洞窟组合而成。

中国石窟开凿延续时间长,地域分布广,有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等,这些石窟建筑和精美的雕刻、壁画、泥塑是我国古代宝贵的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作为北魏时期雕凿的石窟建筑群,融合中西方文化艺术精华,设计精心、凿刻生动,成为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塑艺术史的巅峰之作。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年,洞窟总计254所,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13米以上的造像多达九尊。云冈石窟规模宏大,中西融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是当时东方最为壮观的石窟建筑群。该窟群虽受凉州石窟风格的影响,但在洞窟形制、壁画布局和造像特征等方面都有其独有的特点,并形成一种自有机式。这种样式是北魏与希腊、中亚、印度、波斯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同时随着北魏汉化政策的不断深入而紧密联系。北魏平城时代,平城无疑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云冈石窟的创新成为北魏时期其他地区兴凿窟龕仿效的典型,形成了独有的“云冈模式”。

石窟选址

云冈石窟位于今大同城西的武州山南麓。北魏时期的大同称平城,地处北方交通要冲,既可连接中原,又能通往蒙古高原。石窟距离都城较近,调集人员和物资较为便利,同时山地环境又与城内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能够形成相对安静、庄重的宗教空间。对于皇家石窟而言,这种“近都而依山”的位置具有明显优势。

北魏早期就把武州山列到祭祀之所,明元帝拓跋嗣曾经多次到武州山祈祷,并封该山为常祀之地。《魏书》中记载,北魏皇帝曾多次在这里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武州山在大规模开窟之前已经被赋予一定的神圣色彩。因此,选择在这里营造石窟,并不是单纯寻找适合雕刻的山体,而是在已有皇家礼仪空间上叠加新的意义。山岳崇拜、帝王祭祀与宗教信仰由此进入同一地点,使云冈的空间象征性更加突出。

武州山的石质是侏罗纪透镜体砂岩,为中粗颗粒,主要成分为长石和石英砂岩,质感浑厚、硬度适中。这种岩石便于开凿高大造像,同时能够凿刻出造像细致生动的丰富神情,还可以表现出流畅细腻服饰纹理。云冈石窟范围内的砂岩颗粒色彩丰富,以黄色为主,还有灰绿、灰白、紫红等等,加上起伏流动的自然风化色调,给人质朴温暖的感觉。这些暖色系的砂岩石,恰恰与印度石窟的岩石质地较为一致,工匠精挑细选出他们熟悉的质地进行雕刻,延续西方的表现艺术。

云冈石窟的造像与空间艺术

云冈石窟开凿历经64年,是北魏一朝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宏伟巨制。根据武州山势的自然起伏,石窟分为三个区域,东部第1—4窟,中部第5—13窟,西部第14—45窟,其余洞窟是主要洞窟外规模较小的附属洞窟。石窟开凿工程经历三个时期,早期洞窟分布于16—20窟,中期洞窟分布于1—3窟、5—13窟,晚期洞窟分布于14、15窟,21—45窟以及早、中期洞窟的余留壁画上。

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的代表作品,以北魏早期五位皇帝为原型,突出造像高大伟岸、雄浑威严的气势。从献文帝开始,云冈石窟皇家工程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到孝文帝太和年间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开凿完成的洞窟有1、2窟,5、6窟,7、8窟,9、10窟四组双窟和11、12、13窟一组三窟,以及未完工的第三窟。中期石窟造像,汉文化融合趋势明显,汉式建筑结构、服饰特征、雕刻技艺、装饰纹样和审美风尚随处可见,这是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在石窟艺术中的鲜明体现。造像风格的这一转变,成为佛教造像由胡貌梵相向“改梵为夏”演进的实物佐证。孝文帝迁洛后,云冈石窟的皇家工程基本结束,晚期开凿的洞窟以民间出资开凿为主,洞窟规模较小,造像清秀清像,主题更加贴近生活,出现杂技等社火内容,影响了北魏后期其他石窟开凿的主题设计和造像风格。

云冈石窟的开凿背景及艺术特征

文莉莉

从洞窟空间看,云冈石窟还表现出由大像窟向塔庙窟、佛殿窟等多种类型发展的趋势。不同形制对应不同的礼佛方式,观者与造像之间的距离、绕行路线以及停留位置也随之改变。早期大像窟强调进入洞窟后的仰视体验,巨像通过尺度差制造威严敬畏的心理感受;中期空间更加开敞,建筑构件和连续龕像引导观者在洞内移动,使人自然沉浸在艺术氛围之中。由此可见,云冈石窟的洞窟结构并不是简单静态的雕塑容器,而是按照宗教行为而组织的建筑文化空间。

云冈石窟艺术还具有鲜明的整体性。主尊造像通常以巨大尺度控制洞窟中心空间,弟子、菩萨、飞天、力士、供养人和小型龕像分布于周围壁面,通过造像的大小和位置差异形成清晰的等级分布。中期壁面装饰增多后,雕刻者又借助列柱、佛龕、屋形建筑和边饰图案进行分区,上下分层左右分段,使复杂的图像保持一定秩序。建筑限定观看范围,雕塑形成视觉中心,装饰纹样连接各个区域,人的活动则赋予空间实际功能。正是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云冈石窟既有宏大气势又有丰富细节的艺术特征。

云冈石窟的文化价值

云冈石窟的重要价值在于:其一,它是由北魏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建筑群,洞窟建筑规模宏大,雕刻艺术精湛。昙曜五窟中13米以上的巍峨巨佛是北魏五位帝王的化身,既有犍陀罗艺术的典雅,又有鲜卑民族的豪迈。造像挺拔的身姿、宽厚的肩膀,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体态特征。

其二,它是1500年前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血脉交融的见证,体现在建筑形式、壁面布局、人物雕刻乃至装饰纹样的种种细节当中:印度的佛陀、希腊的柱式、波斯的纹样、中原的衣冠,不同文化在此相互交融,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云冈范式”。

其三,它仅用半个多世纪,在云冈石窟早、中、晚期的凿刻中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建筑样式和雕刻风格,实现了西方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性转折。早期洞窟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的顶级作品,造像雄浑伟大。中期洞窟雕刻以中华艺术立足,东西文化交融。这时期,造像面部从棱角分明转为方圆柔和,衣着雕刻从偏袒右肩改为褒衣博带,这些看似细小的变化,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兼容与变迁。晚期洞窟规模虽小,造像却风格迥异,创造了云冈石窟又一美学巅峰。晚期造像五官以线刻为主,面容修长、细颈削肩、秀骨清像;菩萨细腰长臂,身段婀娜,衣袂飘飘,将中国审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

云冈石窟并非由单一因素促成。北魏都城平城的政治条件、武州山的地理与岩体优势、皇家礼仪需求以及佛教传播共同推动了这一大型工程的诞生与发展。60余年的持续营造,又使外来造像艺术在不断吸收北方民族和中原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发生转化。其早期雄浑、中期雍容、晚期清秀的风格变化,与洞窟空间和礼佛方式的调整相互对应。正因为云冈完整保存了这种由输入、融合到本土化的过程,它才不仅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窟遗址,更是理解北魏社会文化以及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作者系北京建筑大学在读博士、云冈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